

清明·忆亲

岁岁清明

眺望

□汪树明

母亲挺直身子,站在南大渠边上眺望着,等待我。

小时候,母亲总是这样等我回家吃饭。那时的我是个野孩子,放了学,家也不回,一直疯玩到暮色四合,肚子咕咕叫,才猛然想起该回家了。就在这时,母亲绵长而焦急的呼唤声总会穿过树林,越过草堆,沿着弯曲的土路飘到我耳边:“小四(我乳名)——回家吃饭啦——”声音里,带着些许沙哑,些许急切。我顾不上拍打身上的尘土草屑,拎起地上的小书包就狂奔起来。远远地,总能看见母亲站在草屋旁的土堆上张望。见到气喘吁吁的我,她一把将我拽过去,那双温暖的手轻轻拂去我头上的草屑,拍去我身上的泥土,嘴里念叨着:“吃饭了,也不知道回家。”

在老家读初中时,学校离家有五六里地。晚自习后回家,走在漆黑的乡间小路上,南渠坡上长着芦苇,风一吹,沙沙作响,望一眼堆边的坟头,总让我想起大人们讲过的鬼故事,心就扑通扑通跳得厉害。母亲知道我胆小,她像算好了时间似的,总是早早地为我点亮一盏煤油灯,挂在门口的铁钉上。一望到家里的灯光,我的心就平静下来,脚步也轻快了许多。到家后,母亲接过我的书包,将灯端到桌上,一边拾掇着给我盛饭,一边在灯下缝补衣服或纳鞋底。

我上了高中,继而到外地参加工作,离家越来越远,可母亲的等待却从未停止。她知道我周六下午要回家,周五就开始忙碌起来。她把被子晒得蓬松柔软,让父亲去小街买鱼肉。有时我晚些,母亲就去南大渠边上等我。当我进门时,她立即端上饭菜。吃饭时,她一个劲儿地劝我多吃点儿,夹菜的手就没停过,恨不得把一桌子菜全让我吃下。

母亲83岁那年,我在县城买了房,将她从农村接到身边。离开了生活一辈子的土地,母亲像一棵移栽的老树,总有些不适应。她常常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:“你们这么忙,我在这里吃闲饭,真是老了,没用了。”听到这话,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我吃了二十多年母亲烧的饭,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,而年事已高的母亲,却因为帮不上忙而深深自责。闲不住的她,只好每天提前淘好米,择好菜,整整齐齐地摆在厨房,等着我们下班回家做饭。

2008年,母亲不幸摔坏了一条腿,从此只能与床为伴。我每天出门上班,母亲那不舍的目光就追着我,一直追到我走出房门,走出她的视线。那目光里,有留恋,有不舍,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。每次推开家门,无论母亲是睡着还是醒着,她都会睁开那双日渐浑浊的眼睛,紧紧盯着门口。看见我的那一刻,她总是说出一句让我揪心的话:“你回来了。”那一刻我才明白,从我早上出门的那一刻起,母亲就在等我回家,一直等着,等着。那两年,为了母亲,我推掉了所有的朋友聚会、饭局宴请。

2010年10月,88岁的母亲走了。按照她的遗愿,我们把骨灰安葬在老家的南大渠边上——那个她无数次眺望、等我回家的地方。看着新立的墓碑,我忽然觉得,那挺立的墓碑多像站立的母亲啊。从此,那里又成了她等我的地方。

又是一年清明将至。我知道,母亲又站在南大渠边上眺望着,等待我去看她了。

□陈卫中

节气里的清明,充盈着耕种的信号。爷爷能看懂那本发黄的万年历,知道这时候他在地里该做的事。奶奶不识字,但她能准确接收节气的讯息。“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”,她要在菜园内松土,施肥,种豆,种瓜,为了一家人的灶台和餐桌,让大人和小孩筷子有地方可伸。梢瓜是必须有的,可以拿起来就吃,也可以切片凉拌。南瓜也是必须有的,可以烧成菜,还可以做粮煮饭。

踏青,对农村的孩子没有多大意义,我们整天在“青”里踏来踏去。作为节日活动,清明扫墓

印象最为深刻。学校总是要组织扫墓,村里就有烈士墓。排着长长的队伍,步行前去烈士陵园,低头默哀,听老师讲烈士保卫家乡的那些并不久远的故事。

是节气,又是节日。一众节气和节日中,唯有清明,为什么呢?先有节气上的清明,还是先有节日里的清明?一些人在扫墓,一些人在踏青,悲伤和快乐,为什么在清明这一天一同出现?这些问题,是伴着个子的长高,一天天冒出来的。

“节气汉立,节日唐成。”老师让我们记住这样的习俗演变。

“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”,苏轼在寒食后,把思乡的惆怅化作对当下的珍惜。“独绕回廊行复歇,遥听弦管暗看花”,白居易在清明夜里,品味独处的宁静。古诗词里的清明,对逝者的深切缅怀,对生者的殷殷期许,藏着最真实的人生。

父母离去,我们的清明在冰冷的石碑前,化作悲恸的思念。孩子日渐长大,我们的清明从青团的制作慢慢转向大美春光。

追忆过往,拥抱春光,把思念藏在心底,把热爱写进生活。岁岁清明,年年清明。

难忘的身影

□张峰

在我记忆深处,父亲的身影总与家乡袅袅的炊烟、田埂尽头那座斑驳的校舍紧紧缠绕。他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师,用39年的光阴在郭墅镇西北的热土上,一笔一画书写着平凡与厚重,将一生的热忱都倾注在了乡村教育的方寸天地里。

父亲的教学生涯,始于大集体时代的代课岁月。那时没有固定薪资,辛劳的回报不过是几分工分,可他却像守护珍宝一般,把全部心血都扑在一群乡村孩子身上。我至今清晰记得,儿时趴在教室破旧的木窗棂外,看他站在简陋的土坯讲台上讲课的模样——声音洪亮,眼神清澈,仿佛那方小小的讲台,就是他穷尽一生要坚守的天地。

父亲一生老实本分,做事向来严谨认真,这份踏实也让他在学校里挑起了更重的担子。他的教育足迹,从最初一人撑起村初小全部教学任务的艰难,一步步延伸,慢慢覆盖了郭墅镇西北片的一所又一所小学。无论走到哪所学校,他都用心教好每一堂课,真心对待每一个孩子,赢得了乡邻们发自内心的好评。

父亲不仅在学校里受人敬重,在村里更是乡亲们最信赖的“主心骨”。村里的红白事,乡亲们都会请他来主事。他性子沉稳,遇事不慌,考虑问题周全细致,总能把繁杂的事务安排得妥妥帖帖,让双方都满意舒心。每到除夕下午,我们家更是热闹得像赶集市一般,乡亲们腋下夹着红纸,络绎不绝地赶来,请父亲写春联。父亲的毛笔字工整有力,透着一股子精气神。他总会提前备好桌子、研好浓浓的墨,笑着接过乡亲们的红纸,耐心问清每个人的心愿与期许,然后凝神静气,挥毫泼墨。不一会儿,一副副带着墨香、承载着满满祝福的春联便在他笔下诞生。看着乡亲们小心翼翼地捧着春联、笑着道谢离去的背影,父亲的脸上总会露出最欣慰、最满足的笑容,那笑容里,藏着对乡亲们的真诚,也藏着一份被需要的幸福。

或许是一生太过操劳,又或许是性格内向,他退休后始终难以适应清闲的生活。刚卸下教鞭不久,父亲就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。曾经那个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、意气风发的教书先生,那个写春联时挥洒自如的父亲,渐渐变得行动迟缓、手脚颤抖,生活质量一落千丈。看着父亲被病痛折磨的模样,我满是心疼,却又无能为力。我们能做的,只有尽心尽力地照顾他,陪在他身边。

如今,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快五年了。岁月流转,时光匆匆,他用一生的坚守与付出,诠释了一名农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;他用善良、真诚与踏实,温暖了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我的父亲,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,却在漫长的岁月里,活成了我心中最可敬、可亲的模样,成为我此生永远的牵挂。

“满水缸”的父亲

□朱明军

父亲走后,母亲一个人住,老人家喜欢老宅那股味,还有随处可见父亲曾经用过的老物件。

过年前,我和妻子早早地把老宅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除夕那天,我去水缸取水,发现水缸的水已经见底,顺手拧开水龙头。“哗哗”的流水声被坐在隔壁的母亲听到了,老人家推开窗户: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,还满啥水缸?你们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,我就啥都满足了。”

母亲一句话勾起我尘封已久的记忆,仿佛父亲那清朗的号子声又回响耳畔……

父亲退伍后就一直在大队做会计,可过年“满水缸”这一环节,非他莫属。父亲个头不高,身体也不算壮实,母亲特意请箍桶匠“箍”了两只偏小的木桶,配上那根毛竹扁担挑起来“养肩”。母亲平常把毛竹扁担放在猪圈的桁条下,只有父亲“满水缸”时才取下来。

老家过春节有初一不“下生”的习俗,除夕那天我们忙着搓汤圆、煮陈饭、余猪食,把初一的活儿都准备妥帖了,然后将大缸小盆收拾干净,就该父亲上场了。我们家紧靠“福泰港”边,家里加上奶奶九口人,就修了个专用水码头。父亲“满水缸”前会去码头看看跳板有没有松动,台阶的草皮是否踏实,从猪圈里抽出那根扁担的时候,父亲就像一名战士准备上战场。

父亲平时几乎不挑担,可一旦扁担搁肩,随着一声“好不过的由呢来——”那一声清朗的号子声顺着福泰港的河水,爬上两岸芦柴架顶,闯进农家人耳鼓,熟悉的邻居听到号子声后都会说:“朱会计开始‘满水缸’了。”来到厨房门口,父亲侧过身,水桶一前一后贴着厨房门进来,父亲先抬高担子前面那只木桶靠近缸口,我和三姐这时一人揪一边桶系,把水桶稳稳粘着水缸,“哗哗”的倒水声和着父亲粗重的喘息声充斥在不大的厨房内。父亲一般得挑十来担水,家里的大缸才能满,父亲挑到五担左右会停下来抽根烟。母亲在父亲抽烟的空隙把大缸里的水舀到小盆、汤罐等盛水的容器里。整个“满水缸”的过程,父亲要抽三支烟,这也是父亲在家抽烟奶奶唯一不责怪他的时候。

老房子拆建那年,父亲腰已经佝偻到不行,但还坚持自己去猪圈抽出那根扁担。一头支在地上,伸手去压了压扁担,毛竹扁担的弧度肯定没父亲腰那么弓,就好像父亲当年担水时为防步子紊乱水溢出桶外,只有喘着粗气弓下腰,稳住两桶水。其实,父亲稳住了桶,也稳住了当年我们一大家子的生活。